



明代苏文研究史

本书对苏文研究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了苏文研究史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成果，探讨了苏文研究史的发展规律，为苏文研究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书是苏文研究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苏文研究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江 枏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苏文研究史/江枏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10-04668-4

I. ①明… II. ①江… III. 苏轼(1037~1101)—小品文—文学研究—明代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467 号

明代苏文研究史

作者:江枏

责任编辑:蒲浩

封面设计:章雷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93

编辑部电话:0791-6899010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210-04668-4

赣版权登字—01—2010—1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5.00 元

承印厂:江西省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丹井文丛”总序

洪崖丹井是南昌最古老的名胜古迹。先有洪崖,后有洪都。据传,黄帝乐臣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山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接着,他辗转来到梅岭,于洪崖凿井五口,汲水炼丹。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如谢庄、张商英、欧阳修、周必大、张位、汤显祖、岳飞等接乐臣伶伦之踵而来者甚众,可见,梅岭富有仙灵之气,乃养性问学之良地。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坐落梅岭脚下,学院现设中文系、传播系、新闻系、社会学系等4个系以及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欧洲研究所等2个科研机构,教师来自大江南北,计6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5人,博士26人,硕士生导师23人。经全院师生沉潜奋发,学院快速发展。仅2009年,我院就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和民政部项目5项,获江西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可喜可贺的是,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院作为全国首批33家获得MSW(社会工作)专业学位试点单位之一。

应该说,这些发展和全国同行相比,仍然有明显差距,也更需整个团队以开放的视野,以相容为让的精神,坚持不懈,拓井深探,方可成更为恢弘之交响。为此,我院取丹井之意,推出“丹井文丛”。“文丛”包括“丹井论丛”、“丹井译丛”等系列。诚愿“文丛”能够得到全国同行之细察、批评与帮助。

明代大学士张位游梅岭时曾写道:“逢泉皆可坐,击石自成吟。”愿我院师生秉持团队合作与不断创新之精神,汲取诸泉英华,而后自成款曲。

是为序。

陈家琪
2009年11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苏文研究的平静发展期	1
第一节 开国之初的平静状态	1
一、元末明初选录苏文的总集	3
二、开国文臣们对苏文的评价和模拟	13
第二节 台阁文风笼罩下的苏文命运	31
一、杨士奇的苏文观	33
二、程宗等人对苏集的编刻	35
三、程敏政等人对苏文的讥评	44
四、李东阳与苏文	48
第二章 苏文研究的变化过渡期	54
第一节 前七子时期杨慎等人对苏文的评论	55
第二节 唐宋派的苏文观	60
一、唐宋派对文章的取向	60

二、苏文在唐宋派眼中的地位	65
三、《文编》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苏文	67
第三节 王世贞和徐渭对晚明苏文研究的影响	87
一、王世贞对苏文的编选和研究	88
二、徐渭与苏轼小品热潮的兴起	104

第三章 苏文研究的繁荣深入期(上) 114

第一节 苏文研究的兴盛局面	115
一、苏轼小品的广受欢迎	115
二、对苏文的空前推崇和全面评论	121
三、苏轼文集的大量出现	129
第二节 苏文研究繁荣的原因	131
一、性灵文学思潮的需要和推动	131
二、小品阅读创作的繁荣兴盛	137
三、读者对东坡的钦仰和同情	141

第四章 苏文研究的繁荣深入期(下) 146

第一节 《苏文忠公全集》	146
一、编者茅维及其有利条件	146
二、《全集》的编辑过程和编次体例	149
三、《全集》的长处与不足	155
四、《全集》的流传	156
第二节 《东坡先生外集》的重编	160
一、重编前的《外集》线索	160

二、《外集》的重编过程	163
三、《外集》的内容和编次	166
四、《外集》的价值与不足	168
第三节 重要苏文选本	173
一、《东坡志林》	173
二、《坡仙集》	181
三、《苏长公小品》	189
四、《东坡禅喜集》	194
第五章 明末苏文研究的回落	200
第一节 回落的各种表征	200
第二节 回落的原因分析	207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1

绪论

由于三苏父子皆为文章大家,一般后人在述及时会有所区别,如以“老苏”指苏洵,以“大苏”“长公”“坡仙”“文忠公”等指苏轼,以“小苏”指苏辙。这里的“苏文”特指苏轼的散文。如此简称,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古文大家中,向来韩、柳、欧、苏并称,不会有人将其中的“苏”理解为苏洵或苏辙;再则,清代以来的学者已习惯用“苏诗”指苏轼的诗,以“苏词”指苏轼的词,那么以“苏文”指代苏轼之文可以看作这种惯例的延续,也符合其在三苏中尤其特出的实际。^①“苏文”的范围包括苏诗、苏词和其学术专著之外的全部文字作品,有 4000 余篇,其中以古文为大宗,以及大量的骈文和数十篇赋作。这也是历代文章家对苏文的一致看法,他们在编选苏文选本时,选入各体文章,并无骈体、散体和赋体之

^① 付琼认为“所谓‘苏文’大都指三苏文,苏轼散文的专选一般都有‘东坡’‘苏文忠公’‘苏长公’等明确的限定语”,其统计的 102 种明代苏文选本中,苏轼的占 72 种,17 种清代苏文选本中,苏轼的占 14 种。参见付琼:《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1—162 页。

别,而茅维编成的苏文全集,则是这种观点的完整体现。^①

以“苏海”来形容苏轼文化世界的浩博无垠,已为定评,因为“非大海之广不足以言其‘波澜浩大,变化不测’,非大海之深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兴,贯通天人’”^②。那么,我们可以说,4000余篇苏文即是其中最重要的“海”域。如果允许把苏轼所留下的丰厚遗产分为诗、词、书、画、文章和学术著作等门类的话,文章应算最大的一宗。它数量最巨、内容最富,因而最具“海”的特质。事实上,当李淦提出“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比喻时^③,就是针对各家的文章而言的。后人感觉此说并非完美,遂逐渐调整为更能获得认同的“韩文如潮,苏文如海”^④,以后再变为对苏轼整个文化世界的代称。从单指苏轼文章到形容其全部文化遗产,“苏海”内涵的扩大经过此处虽无法一一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清中叶王文诰以“苏海识馀”来指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的补遗部分时,其含义已经清楚。

历代以来,这片“汪洋渺弥、横无涯际”的学术海洋吸引着无数“观海者”走向它^⑤,因为苏轼“总是拥有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研究者和文艺家,引起他们连绵不断的文化怀念,形成了一部以审美陶冶、理性阐释和创作滋养为内容的苏学接受史”^⑥。这部“苏学接受史”虽然还没有形成文本,但足以成立。苏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文化力量产生的交互作用,不同的受众如何从中各取所需、得到滋养和沾溉,以及以此形成并反映出的各种相关文化现象,就是这部“苏学接受史”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条件也有必要来对之加以考察、归纳和总结,形成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成果。

① 当代学者对此也有论述,如杨庆存就论证过骈文和赋都应属于散文的范围。参考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第二章“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 王水照先生《走近“苏海”》,见《苏轼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李淦《文章精义》,见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5页。

④ 王文诰《苏海识馀题记》提到明代吕令黄大鹏在东坡当年于古劳(今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渡江处之山崖刻“苏海”二字,以名该地。此后清初吴伟业的《苏长公文集序》中已认为李淦之说“非确论也,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该文不见于《吴梅村全集》,此处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上编第3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94页。

⑤ 王文诰《苏海识馀题记》,见《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册《苏海识馀》卷一标目之下,巴蜀书社1985年版。

⑥ 《苏轼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这对将来的苏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无疑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各部分的研究和接受还是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就文学方面而言,对苏诗、苏词、苏文的研究方式不一样,比如和苏诗、苏词相比,苏文长期无编年本,也无注本^①,三者地位和受到欢迎的程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色。正是这种此起彼伏的不同步构成苏学研究连绵不绝的面貌,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那么,要准确地反映这种面貌,就不是只揭示某一部分的研究规律和特征所能承担。比较好的选择或许是将各部分的接受、研究历程作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梳理,再全部呈现于读者面前,苏学研究和解读的整个面目则可以大致清楚。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文研究史因此有了写作的必要,这也是本论题的主要价值所在。“观于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②,看那些“观于海者”如何“朝宗”,也为后来者提供可能的借鉴,当是一个很可发掘的学术命题。

由于时间、资料和学力的限制,本文暂选取苏文研究史上最为突出的明朝时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从苏文来看,明代是一个真正的高潮期。有关的选本大量出现,并第一次出版了苏文的全集,苏轼的各体文章都受到注意和重视。如果和同时期苏诗、苏词的研究作横向比较,苏文的研究最为充分,读者最广泛,得到的重视最多;如果和明代之前、之后的时期相比,此时期的苏文研究也是特色鲜明,全面繁荣。所以可以说明代是苏文研究的高潮时期。王友胜认为:“就其与苏轼其他体裁的比较而言,明人对苏诗的热情让位于苏文。”^③确是如此。

尽管明代的苏文研究不能看作整个苏文研究史的缩影,但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读者对苏文的选择评判过程也构成了从平静发展期、变化过渡

① 南宋郎晔有苏文选注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60卷。明代董斯张《吹景集》卷三《东坡与湖士有笔墨缘》记载:有名王復之者,“尝评注坡文十许卷”,陈眉公曾为之叙,但该书今未见(崇祯己巳刻适园丛书本,第54页)。今人吴雪涛有《苏文系年考略》,对大部分苏文作了编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最近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对苏文始作较全面的编年和校注。

② 王文诰《苏海识馀题记》,见《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册《苏海识馀》卷一标目之下,巴蜀书社1985年版。

③ 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6页。

期、繁荣深入期到逐渐回落的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各种文学思潮与苏文研读之间发生的复杂深刻的关系,明代特有的科举考试内容对苏文研究的影响,都是苏文研究史上的大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并尝试解决它们,无疑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探寻方法,开辟路径。

关于苏文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但研究史是着眼于研究的研究,这方面目前还不够。比较重要的有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纂的《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苏文的内容。它为苏轼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可资利用的材料,或能提示查找资料的线索,其价值无疑很高。不过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首先在于搜罗不全,如明代就漏掉了袁宗道、袁中道、董其昌和钟惺等人对东坡的评论。其次是错误不少,以第1054页的《东坡禅喜集序》为例,作者阙名,实为陈继儒;“三寸不烂舌”应是“三寸辘轳舌”,“一点眼便如昂首飞去”应为“一点眼便欲昂首飞去”,“而唐徵明刻之”为“而唐元徵欲刻之”,“而始得为东坡者,宋几无才子矣”应为“而后得为东坡。不者,宋几无才子矣”。第1055页唐文献的《跋东坡禅喜后》中“则草木瓦石,无非大善前识;不摇不动,瓦漂石鸣,无非老胡痛棒热喝”实为“则草木瓦石,无非大善知识;草摇木动,瓦漂石鸣,无非老胡痛棒热喝”。如此之类甚多。另外,因为是苏轼的资料汇编,所以对苏文的研究来说,不便于使用。

由曾枣庄先生编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苏文汇评》则弥补了上书的后一个缺点。将历代对每一篇苏文的全部评论搜集在一起,书末附以关于苏文的总评,给研究者查阅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但它实际上是《苏轼资料汇编》的分体编排本,还不具备“研究史”的性质和格局。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的《苏轼研究史》由曾枣庄先生主编,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苏轼研究史,包括了苏轼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这一开创性的尝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由于“苏海”的范围实在广阔,所以各个时期的研究面貌并不容易把握,不完美之处在所难免,例如该书以“‘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明代‘中熄’期”为第四章的题目。如果从对苏诗、苏词的角度来说,这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从苏文以及苏轼的书法、绘画等角度来看,将明代目为“中熄期”则不尽恰当。

分体研究史方面,王友胜有《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中华书局 2010 年版);张璟有《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两位学者的名著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现成的规范和体例。

目标决定着研究方法和论文体例。力图清楚地展示明代苏文研究的历史,这个目标决定采用从前到后的论述体例是合理的选择。正如历史本身是从先到后的线性发展过程一样,苏文被研究的历程总是前后承传的。当进入新的阶段,因为新的文化因素的作用,它发生新的变化,展现出新的面貌。因此,除了描述苏文研究在前后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色之外,探寻之所以不同背后的原因,显然是着力的重点。苏文研究史以苏文为中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只局限于此的话,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因为我们似乎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苏文对读者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改变着读者的欣赏品味,甚至进而改变着社会心态,但首先是文化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决定着苏文研究的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围绕着苏文这个中心,一方面应探讨其他文化力量如何影响苏文研究的态势,另一方面也通过苏文研究中发生的变化和透漏出的讯息来观照社会人心的变迁。如何避免平实的叙述和介绍,如何做到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都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同时在这个纵向论述的模式中,又必然有横向的比较。一些重要的问题发生在同时代,必须通过横向的比较论述才能说得较为明白。毕竟,苏文的地位高下变动始终是通过和他人的比较而形成的。例如苏洵和苏辙之文与苏文既有联系,又各有面目特点,三苏父子被看作一个群体,有其成立的理由。不过更被普遍认同的应该是唐宋八大家这个群体,苏文的高低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群体中进行的。他们在后人眼中的此消彼长,也因为被后人互为参照和比对而成立。

任何历史的分期都具有相对性,因为一般来说,没有截然分明的临界点,在临界期前后的过渡期里,分属前后期的各种特征都是交错互存,通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在明代苏文研究的不同时期中,这种特征尤其明显。同时截取历史的任何一个段落,似乎都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

晚期。明代的苏文研究分期和明代政治史的分期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按照苏文研究面貌的明显改变,参照文化思潮的变迁而分别的。明代苏文研究的前期最长,大致从明初至正德年间李东阳退出文学舞台,计约 150 年的时间,主要讨论在馆阁文学和台阁体统治文坛时苏文的研究特点。中期从正德至万历前期王世贞去世止,约 75 年,论述在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先后左右文坛时苏文的研究状况以及如何向晚明苏文研究的过渡。晚期从万历中期至明亡,约 50 年,时间最短,却是明代苏文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也是本论文的重点。

这样的安排,或许可以大致反映明代苏文研究的历史脉络。但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苏文与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发生的互相作用,包含的种种规律,以及由此生发的学术命题,都不是如此篇幅的论著所能涵盖的。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和研求。

第一章 苏文研究的平静发展期

——明代前期的苏文研究^①

第一节 开国之初的平静状态

朱元璋在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局面中最终胜出，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作为开国之君，他处心积虑地力图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也考虑着如何把朱家的天下传承得更久长。在政治上除了大封子孙为王，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外，朱元璋还撤销宰相这一职务，让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将专制程度发展到顶峰。只是他的大多数继承者都不如他那样雄才大略、事必躬亲，导致他亲手制定的许多祖宗家法被迫废除或变相废除。

在思想文化上，朱元璋也实行比前代严酷得多的控制措

^① 这里所说的明代前期，是指从太祖开国至弘治、正德李东阳去世、“前七子”出现为界，时段为1368年到1516年，主要以文风的变化为参考标准，因为《明史·文苑一》认为：“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其中又细分为明初以馆阁文人群体为代表的洪武时期、受台阁文风笼罩的永乐至成化时期以及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文风逐渐改变时期。

施。他亲自参与制定科举考试的一系列制度,颁布标准用书,垄断经籍的解释权,以图用功名利禄的诱惑剥夺士子文人自由思想的权力,达到稳固其统治的目的。《明史·儒林一》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①他多次诏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

朱元璋甚至对文人士子的写作也直接加以干预,从《明太祖文集》里,我们可以看到《谕幼儒敕》《驳韩愈颂伯夷文》《辩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③,对小孩子的教育内容、对文章的写作和思想倾向都要求符合他的文教政策,并为之服务。如《谕幼儒敕》中,他因看到那些“幼儒”年未及三十,“皆空度光阴,略不见志出于群者”,于是“令其各日进先儒古文一章,特以习熟,期将来之善作;或四书一章,使诣前而讲,以观利钝,导迪理道也”。又发现诸生所进“其文多韩柳,书皆孔孟”,故借评价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而认为“柳子之文无益也”。《辩韩愈讼风伯文》更是明确交代他的目的:“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着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钦天、畏地、谨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为文永无庇矣。”《驳韩愈颂伯夷文》云:“朕闻儒者多祖韩文,试取观之”,认为韩愈对伯夷“过天地,小日月”的评价太高,“且伯夷之忠义,止可明并乎日月,久同乎天地,旌褒之尚无过于此,何乃云‘日月不足为明,天地不足为容’也?是何言哉?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韩曰:‘过于天地日月’,于文则句壮字奥,诵之则有音节。若能文者,莫出于韩,若言道理,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诬耶?妄耶?韩文名世不朽已千载矣,今为我论,识者莫不以我为强欤?设若不以我为强,则韩文乃至精之撰,犹有其疵,岂不鲜矣哉”。

① 《明史》卷二八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明文书局印行明代传记丛刊本,第136页。

③ 分别见《明太祖文集》卷七、卷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办法是有效的。它们的作用至少持续了明代前期的一百多年时间;横向看,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苏文的研究解读虽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侧面,但无疑不能置身事外。在这种比较僵化的文化氛围中,苏文无拘无束的文风和随机立说的特点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应是明代前期苏文研究处于平静状态的大背景。其平静状态主要体现为: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苏文的选本公开出版^①;读者对苏文的关注度较低,关于苏文的评论较少;当时准备应举的读书人专注于《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官方指定的考试用书,苏文自然受到冷落;从选录苏文的总集来看,苏文在其中的地位也较低。而这时期选录苏文的总集,首先应提到的就是朱右的《唐宋六家文衡》。

一、元末明初选录苏文的总集

——朱右《唐宋六家文衡》

(一)朱右的生平及为文思想

朱右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元朝度过,现能见到的生平资料很少。《明史·文苑传一》载:“朱右,字伯贤,临海人。史成,辞归。已,征修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右长史。九年卒官。”^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稍详:“右字伯贤,临海人,自号邹阳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尝诣阙献《河清颂》,不遇而归。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历》,除翰林院编修,七年,修《洪武正韵》,寻迁晋府右长史,卒于官。”现存有《白云稿》5卷,四库馆臣对他为文的评价曰:“所作类多修洁自好,不为支蔓之词,亦不为艰深之语。虽谨守规程,罕悟变化,未免意言并尽。而较诸野调芜词、驰骋自喜,终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者,有上下床之别矣。”^③他与宋濂、危素、贝琼等当时名家都有颇深的交往。从集中所收的自序文,我们得知他在元末曾编撰和编选了不少有关经、史、文方面的选本,计有《春秋传类编》《书集传发挥》《三史钩玄》《秦汉文衡》《唐宋六家文衡》《元朝文颖》,此外宋濂《白云稿

① 付琮认为“苏文选本的公开流行是从李梦阳死后开始的”。见付琮:《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李梦阳卒于嘉靖八年(1529)年底(公元1530年1月)。

② 《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21页。

③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白云稿》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7页。

序》称他还有《深衣考》《邾子世家》《元史补遗》，涉猎颇广，惜都已不存。

朱右在为所编各书作的序中比较明白地表达了他的为文观点，首先是尊经重道，“文所以载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谓文者妄焉耳……然载道之文，莫大于六经”^①，这是他最基本的论点，也是元末明初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如宋濂的《白云稿序》将各种文体和六经加以具体比附：

刘勰论文有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文檄则《春秋》为其根。呜呼！为此说者，固知文本乎经。而濂犹谓其有未尽焉，何也？《易》之象象文言，有韵者即《诗》之属，《周颂》敷陈而不协音者，非近于《书》欤？《书》之《禹贡》《顾命》，即序纪之宗，《礼》之《檀弓》《乐记》，非论说之极精者欤？况《春秋》谨严，诸经之体又无所不兼之欤？错综而推，则五经各备文之众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夫经之所包广大如斯，世之学文者，其可不遵之以为法乎？……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与道一，道与天一，故出言无非经也。^②

宋濂是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人之首”的人物，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朱右显然与之同声相应，主张为文不仅仅是余事，而是关乎天下治乱兴亡的大端，所谓“气化流行之谓道，道之显著之谓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国家之气化系焉。”^③

他认定“言”的特征是“政”的状况的反映，所谓

言者事之枢，非言无以知其政之尚，言其可诬哉？是故言正以愚，知其忠，见于政也，义而固；言祥以和，知其孝，见于政也，仁而洽；言清以要，知其静，于政也，无为而不争；言大以醇，知其圣，于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确，知其疆，于政也，霸而不久；言勤而不怨，知其基，于政也兴；言思而不惧，知其离，于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教，盖殊途而同归也。^④

这里所说的“言”也即“文”。无疑他继承了《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

① 《白云稿》卷五《新编六先生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白云稿》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白云稿》卷五，《元朝文颖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白云稿》卷四《交山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